

75
1945-2020

从南洋到北大的人生轨迹(四)

——回国“落地生根”纪实 作者：赖荣源

中，我们十位华侨同学和班上其他同学相处时都努力做到“同住”“同吃”“同学习”和“同成长”。在住宿上我们没有特殊，每间宿舍分配八个人混合住，其中由于华侨同学行李多，就安排一个床位专门堆放行李，来自不同地方的同学经济条件和生活习惯不同，尽能做到相互包容、尊重和理解。

我们华侨同学面对许多新的情况和生活条件，需要调整自己以适应这些变化。不论回国前是否有思想准备，我们经过努力都能逐渐顺应和融入到新的集体生活中。比如华侨同学在海外有爱洗澡的习惯，而学校限于条件只能安排每班两个星期集体挤着洗一次澡。开始时我们几个还抽空跑到补校那个露天洗澡地补一补，后因路远，天气又渐冷，只好改在学校的盥洗间擦擦身，这就算过了一桩“生活关”；在海外我们一般没有自己动手洗衣服的习惯，刚开始学校还给以关照，从校外安排来人收费代洗衣服，在设法学会使用搓板揉洗衣服之后，衣物都改为自己洗，培养了独立生活的习惯；在海外我们吃惯白米饭和牛奶面包，刚回国时连山东筋面白馒头也吃不惯，到学校后，开始时学校为了在生活上照顾我们这些归侨新生，允许我们到条件较好的教师食堂入伙，但是我们不想特殊化，坚持要在学生食堂与其他同学同桌用餐。那时学生食堂每月每人的伙食费是八块钱，供

应的主食中几乎没有白米饭，连白馒头也成稀有物，每天吃的几乎都是玉米面做的窝头和丝糕，还有高粱米饭，如有玉米面和白面做的金银卷就算是改善了；副食方面供应的不外乎是当时北方常备的大路菜即大白菜、白萝卜、白豆腐，还有胡萝卜，间或能吃到肥猪肉片。这样的伙食水平同样没有影响我们的思想情绪，倒是可视为回国要过的又一个“生活关”。

实际上八中学生的学习生活是有张有弛，其中不乏饶有情趣的活动，除了每年到京城诸多公园集体组织生趣盎然的春游和秋游活动外，周末时间还可以到北京（国家）图书馆听专家学者的专题报告或到名人故居参观学习，或随学校的文艺爱好者小组访问著名作家等；不过就我而言周末时间可个人自由支配，安排活动更显轻松自在。

八中地处按院胡同，离西单闹市仅隔一个街区。我经常利用周末上街，上午到位于西长安街的首都电影院观赏一两部国产或苏联的励志片或文艺片。其中当时给我印象深的是《夏天的故事》，由著名青年作家刘绍棠编剧，著名青年演员赵联主演，叙述一位知识青年响应时代号召回乡务农，为建设新农村作贡献的励志故事；还有讲述苏联卫国战争英雄故事的影片《青年近卫军》和《普通一兵》。走出电影院后便可就近到一家合作食堂（我们一般均为当时盛行的“消费合作社”的会员）



1955年夏赖荣源(前蹲右二)等少先队辅导员合影

用餐，那时我喜爱的美食“快餐”是一份糖醋鱼片加四两白米饭或一盘木樨肉炒饼或肉丝炒面，餐后到西单商场间或买一包核桃仁牛轧糖或小白兔奶糖这类零食，最后压轴的是到我的最钟爱的去处——新华书店。书店里各类书籍琳琅满目，真是博览群书的好场所，是学校小小图书室无法比拟的，一排排新书可以随便浏览，自由翻阅，碰到心仪的图书精品，可拿到一个角落仔细赏阅，有的爱不释手就买下带回。在书店驻足翻书，往往觉得时间溜得快，似乎一眨眼的工夫就到了该回学校的时间，赶去吃晚饭，上晚自习。周末这一天过得满满实实，给我个人留下别样的感受：大快朵颐诚可贵，书海泛舟价更高。

在八中高中三年，我作为归侨学生始终不忘回国初衷，自觉自愿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发挥主观能动性力争使自己能更快更好地融入到国内的新社会和学校的新学习生活，以行动争做一个思想品德好、

学习好、身体好的三好学生。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不懈的努力，在1955年双喜临门，我先后光荣地获得了北京市优秀学生奖章和加入了共青团组织。

在这个期间，有一次上作文课，老师出了一个有意义的命题，即仿照苏联名著《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作

者尼古拉·奥斯特洛夫斯基在1935年应《世界上的一天》征文撰写的《我的一天》的题目做一篇作文。在我作的《我的一天》中，我有意将日常严肃紧张的课堂听讲与课外阅读、雷打不动的晚间自习、课余生动活泼的体育锻炼及其他宣扬团结和谐的集体活动等一系列内容，同丰富多彩自有情趣的周末度假活动内容糅合浓缩成一天发生的事情，通过这样的特殊构思，我试图将《我的一天》写成全面反映我在八中学习生活的某种“虚拟化”缩影，从中可以透视出我在精神食粮重于物质享受，精神生活高于物质生活的人生感悟与追求。老师给这篇作文打了当时通行的五分制的5分，在作文篇末还留下这样的评语：“祝贺新的政治生命的诞生”。正是有了这样一篇作文的机缘，后来当海外的一位亲戚写信希望介绍我回国后的学习生活和心得体会时，我顺手将这篇作文稿找来，抄写一遍，寄给他供参阅赏析。他收

阅了以后有何看法和想法，我一直没有问过，他也没有跟我提过。不过，在上世纪50年代不断涌起的回国升学大潮中，他和其他的许多亲戚们都陆续回国开始新的学习生活。时过境迁，到了70年代国内归侨界中出现了一股出境潮，许多归侨根据国家执行的“来去自由”政策办理了出境手续，移居港澳或海外。此时我们亲戚中间有一位无不诙谐地对着我说：荣哥当年可是大家回国的一个带头羊，你看现在我们落得这个样子……。她的这一说法，令人无语，感到莫名了。

1956年我在北京八中高中毕业，当年按规定中国人民大学先于其他高校单独提前举办招生考试，我根据个人志趣和愿景报考了该校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和马列主义基础两个专业。我们是在当时还处在市中心铁狮子胡同一号的该校校舍参加考试的，考后我一直没有收到录取通知书，而其他报考的同学都已收到。这样我就转而参加北京大学的招生考试，第一志愿历史系世界史专业没有考上，考上了第二志愿经济系当时唯一的政治经济学专业，我按时报到上课。不过此时出了一桩糊涂事，我突然收到中国人民大学统计系的录取通知书，来得像一个过了时限的“无厘头”，且又是一个我没有报考的专业，这样我只能将它束之高阁，专心在北大经济系念好书。

未完，下期待续